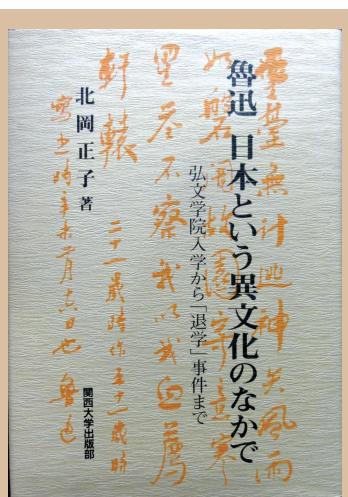


鲁迅伴我行

□(日本)北冈正子



北冈正子著《鲁迅:在日本这一异文化中》,关西大学出版部2001年版

今年,鲁迅诞辰130周年,逝世75周年。

回想起来,我第一次读鲁迅的文章,是1954年,那时我刚入大学中国文学科不久,学习汉语才两三年。读的是《孔乙己》。对于一个连初级汉语都没念完的学生来说,拿这篇作品当课本,实在强人所难。选来做课本的理由,好像是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教材,而这篇又短,于是“就它吧”。老师要求课外交作业查典故,课上紧赶慢赶不说,下次上课时学过的地方还都得背诵下来。所以,时至今日还会脱口而出:“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学生们之间见了面,也是“我都快要背死

了!”第二年升大二,讲读课本选的是《呐喊》。一本红皮书,现在还留作纪念,版权页上写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11月北京重排第1版,1954年1月北京第四次印刷。我觉得战后在书店书架上能够最早看到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就是鲁迅的作品。

那时的我开始参加鲁迅研究会。该会是无所属的自立研究会,会员有大学生和社会人士,大都是20多岁的青年。每周集聚一次,读鲁迅作品并交换意见。研究会充满了一股思考风气,那就是学习鲁迅精神从而确立起自己在战后日本社会的生活方式。我们当时是把人民中国的青春与自己的青春重叠在一起,并通过读鲁迅迈出走向未来的一步。研究会的集体阅读讨论的记录,登载在眷印版薄薄的《鲁迅研究》杂志上。研究会的规模不大,但杂志的读者却遍布日本全国。研究会大约持续10年,杂志出了30几本便结束了。

可以说参加这个研究会,左右了我此后的人生。在鲁迅研究会里,我和大家共同阅读了鲁迅的很多作品。我们相互确认作品文意,直到都能理解透彻,也相互切磋探讨如何读取鲁迅所要表达的意思,我们就是这样,在共同理解的基础上,一篇一篇地去解读鲁迅的作品。在这潜移默化当中,不论遇到什么问题,我都会自问是否是鲁迅处在这样的时候会去怎样做,同时也会联想起在研究会上大家通过讨论所获得的共识,并以此来衡量自己。在研究会上,我遇到很多值得尊敬的学长和朋友。其中就有已仙逝他界的丸山升和伊藤虎丸。当我遇到困难,感到气馁时,因鲁迅而与他们结下的友情曾多次给予我以勉励,使我能够走到今日。

我在研究生院写硕士论文,是1960年代初。题目是《留学日本时代的鲁迅》。当时关于留学时期的鲁迅,还有很多地方没有探明。有一天,我在大学图书馆找到了一本书,是浜田佳澄的《雪莱》,觉得其中的某些表达方式和内容与《摩罗诗力说》里关于雪莱的部分很相像。我确信这就是《摩罗诗力说》第六章的材源并写进论文里。而查清其他部分的材源,则

是自那以来十几年以后的事了。我把检读的结果,以《摩罗诗力说》材源考笔记》为题,从1972年到1995年(中间有很长时间的休载期)在中国文艺研究会杂志《野草》上连载了24回。我的文章虽然只是“笔记”,然而其能刊载到最后一篇,全都仰仗持续了40年的中国文艺研究会和今年出到第88号的《野草》杂志。

读过我这篇文章的人问我:“资料是到匈牙利和波兰去查的吗?”我的回答是:“不,我从未去欧洲。”可认为是材源的书籍,若日本图书馆未藏,便委托我所在的大学图书馆去向外国图书馆索寄缩微胶卷。另外,在《摩罗诗力说》中还有不少作品并未被译成日语,尤其匈牙利和波兰的诗歌作品,译成日语的就更少。我之所以能够读到几篇这样的作品,全是因为有汉译的缘故。有位先生特意从中国寄赠宝贵的翻译过来。我不曾忘记那时的感动和感谢的心情。而且我以为,鲁迅在日本留学时的20世纪初,正是日本只盯着先进的西欧走向近代化的时期,然而鲁迅的目光所向,却也同时扩及到东欧,今天的中国学者不仅继承了对鲁迅的尊敬,也继承了鲁迅那种睿智的眼光。

我出生于鲁迅逝世的那一年,今年75岁。从曾经工作过的大学退休已经5年。我在供职30多年的大学里跟学生们恐怕是没少读鲁迅的作品。《呐喊》《彷徨》《野草》《故事新编》《朝花夕拾》几乎都读了。杂文也读得相当多。通过在教室里的学习而以鲁迅为毕业论文题目的学生,每年都有二三名。也有学生作关于鲁迅的硕士或博士论文并获得学位。我的承担于教学场所的工作结束了。

而今我想要完成的不是“笔记”,而是货真价实的《摩罗诗力说》材源考,我在与鲁迅的反复而持续不断的对话中苦战。我每天都会感到从《摩罗诗力说》里新发现的东西怎么会这么多。我在年轻时学汉语并与鲁迅相遇,现在已踏上人生旅程的黄昏,却仍在前行的途路不断获得鲁迅的教示。

(作者系原日本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



《大鲁迅全集》



我与《故乡》

□(日本)永井英美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刮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记得的故乡?”

这是鲁迅的《故乡》(《呐喊》)的开头部分。这一短篇小说被收入到日本中学的语文教材,是许多日本人都熟知的篇目。近40多年前,我也是在故乡的中学里读到的这篇作品。我们的语文老师是在我们村子里一座规模较大的寺庙的住持,他告诉我们鲁迅是在日本编辑世界文学全集之类的书时,作品一定会被选进去的中国名家。

主人公“我”乘船回乡时水乡的情景、“大祭祀”、“忙月”、“长年”、“闰土”、还有猹……当时吸引我的不是篇尾关于“希望”的那段名言,而是这些我从未去过的外国的、与阅读西洋小说所获得的印象截然不同的情景以及词汇。

另外,因为我是家里排行最大的孩子,上面没有哥哥姐姐,所以我特别能够体会到主人公对闰土的那种如同对待兄长一般的敬慕之情。闰土讲述的是一个

闻所未闻的美好世界,所以“我”被深深吸引住了。

接下来,就是无可取代的“故乡”这个标题以及作品的主题。

我的故乡不是水乡,而是坐落在盆地里的一个村庄,四面环山。那里只有一所中学,毕业以后我就到邻镇去读高中。由于附近没有大学可上,念完高中便只能离乡。然而,离乡虽然只是短短的5年以后的事,我却并不怎样觉得那一刻的临近。村里生村里长,很少有机会出远门,每天除了与家人、朋友之间的烦恼,有时也为高考会怎样而担忧。

读小说这个最大的爱好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直没有改变过,但当时却连做梦都没想到自己将来会学中国文学,更何况是专门研究鲁迅的小说作品。

30多岁的时候去了浙江大学留学,留学期间以及回国以后,几次去到作为《故乡》舞台的绍兴、以及鲁迅故居参观探访。不知不觉年龄就超过了主人公“我”而与“豆腐西施”有了一拼。中学时代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而我甚至还能喝上一点绍兴酒了,“故乡”早就丢掉,我成为了“异乡”的居民。

在孟兰盆会、正月、以及有社戏“俄”上演的祭会期间我还会回到盆地的村庄。中学时代的语文老师早已去世,寺庙的住持也已经换了别人。作品《故乡》开头主人公所怀有的悲凉之情,也成为了现在还没有什么成就,只有年龄不断增长的我自己的情感。

中学时代的我之所以被鲁迅的《故乡》所吸引,或许是因为无意间感觉到那作品中描绘的正是遥远将来的自己也未可知。

我自硕士论文写鲁迅以来,虽几经间断,却能将他的小说研究到现在,这或许是因为我在其中寻找着被描写的自己的缘故。

此次起草本篇,重读《故乡》,我这样想。

(作者系近畿大学、佛教大学兼课讲师)

鲁迅还是伟大

□(日本)片山智行

鲁迅的文学观很明确,那就是站在“为人生的文学”立场上,“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但又绝不是“为了宣传的革命文学”。

鲁迅的出发点是暴露旧社会的病根,但同时他也为克服中国国民性缺陷(病根)倾注了全部精力。

潜藏在中国国民性当中的疾病是“马马虎虎”。对此鲁迅相当精彩地一语道破。这里所说的“马马虎虎”是广义上的,既包括敷衍和似是而非,又包括瞒和骗,具有广泛的内容。

中国目前经济持续增长,势头很旺,外汇储备已达世界第一。汽车销售台数也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此外,内需也扩展顺利。GDP超过日本,终于跃居世界第二。超有钱的中国人,在人数上恐怕也已超过了日本人。

然而,“马马虎虎”仍在中国社会四处蔓延。譬如,假名牌到处泛滥,DVD、高级包、电器、摩托车等等无所不包。就连吃的东西也弄得“马马虎虎”,混着超标农药和有害物质照卖不误。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当中,中国社会整体呈现出“马马虎虎”的倾向。

观察几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有多少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被揪出,被殴打,被杀害?那肉眼看不到的僵尸在吞噬着无辜的人们。

鲁迅将潜藏在“马马虎虎”当中的僵尸视为中国(民族)的死敌。这僵尸杀不死,斩不绝,与时俱变,变换姿态,不断显现出来。

鲁迅首先在自己名作《狂人日记》中将这持续两千年盘踞在中国社会的僵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其原形毕露:正是支撑封建体制的儒教,才是中国社会当中“马马虎虎”的黑幕。

《狂人日记》的主人公狂人,仔细研究经书,终于看破鼓吹仁义道德的礼教(儒教)的本质,那就是“吃人”。狂人在日记中写道,忠、孝、节都是漂亮的“名”,他在那些漂亮的字里行间看到了“吃人”二字。

儒教最尊贵的孝,原本极具骨肉亲情的意味,只是到了后世走向了非人性的极端,竟鼓励什么若父母生病,要把自己大腿上的肉割给他们吃,或为能给老母亲省下一口吃的,要活埋自己的幼儿之类。《二十四孝图》等书,教诲各种奇怪的孝,每条都讲得非常认真。于是,在封建社会当中,儒教道德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支配了民众意识。

孔子所说的仁,意味着人道主义的极致,但是教诲这个“仁”字的礼教(儒教)在封建社会当中却成为贯彻统治的工具,并且最终化做堪称“吃人”的、非人的封建道德支柱。孔教所实际带来的,是非人的“吃人”的封建社会。“仁”在结果上被“吃人”替代。招牌与实际状态不符,这正是“马马虎虎”而不是别的。

鲁迅在广州做一个讲演,题目叫做《魏晋风度与文章及药与酒的关系》。其中谈到竹林七贤,充分显示了他渊博的知识,不过却只是以此为烟幕。鲁迅指出,竹林七贤不满当时统治者口上尊崇礼教,实际却反其道而行之,于是就特意作出反礼教的姿态来。当时的统治者只是在政治上利用礼教而已。其实,鲁迅做这场讲演的真正目的,是对反共政变之后的政治状况予以讽刺。

鲁迅顺便拿北方封建军阀做比喻,说到目前为止一直压迫国民党的北方封建军阀,看到形势对自己不利,就急忙宣称自己信奉三民主义,是总理(孙文)的信徒。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三民主义的信奉者会加入进来吗?

鲁迅之所以特意提到魏晋权贵和北方封建军阀,是想说强行反共政变的蒋介石,也跟他们一样,都只不过是在政治上利用“名”(在蒋介石,这个“名”就是“三民主义”和“革命”)。鲁迅是暗中批评蒋介石并非革命家孙文的真正继承者。

鲁迅这意味深长的话语,有着贯穿百年时空的普遍性。剩下的就是我们现在该怎么去接受了。

(作者系大阪市立大学名誉教授、关西外国语大学教授)

对许多日本人来说,与鲁迅的相遇大抵始于初中教育所使用的教科书,因为不论在哪本教科书里都会收录《故乡》或《社戏》。当然很多日本人读过也就忘了,但与夏目漱石在中国的被认知度相比,鲁迅在日本更为人们所知。的确,就世界认知度而言,鲁迅远超漱石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总而言之,我也是这样知道鲁迅的一个。不过真正读他的作品,还是进了大学以后。

20世纪70年代后期,京都大学“学生运动”余烬尚热,也还有学生罢课等活动。当学生的我虽还幼稚,但也在思考诸如学问的政治性等问题。我本来想学古典文学,但被有一个朋友批评太资产阶级,而学中国现代文学总是可以的,这才开始读鲁迅。

但到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我才发现关于鲁迅的论文之多,这可把我给“震”了。于是便将目光转向瞿秋白,他是鲁迅周边还没怎么被研究过的人物。一查才知道,不仅鲁迅对他有“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评价,作为左翼作家联盟的理论家他也做了大量工作,而且还借鲁迅的笔名发表杂文,后来还写了构筑各家鲁迅论基础的《〈鲁迅杂感集〉序言》。我的毕业论文总算是因写左联而过了关。

后来,我在金泽大学获得教职,并且调查成为1930年顷之新潮流的“新感觉派”,但对写鲁迅却总有些顾忌。这不仅是因为先行研究太多,也是因为不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那些写鲁迅的东西都把鲁迅塑造成“圣人”。当然,我自己也是那样认为,并不对之抱有异议。虽然也意识到是否存在一个等身大的鲁迅,却不堪重负而终于没能动笔去写。

是一件小小的个案,使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还是应该面对一次鲁迅。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了一个想法,那就是收在《故事新编》里的《理水》是以瞿秋白为原型的。鲁迅在写作《理水》的同时,也在编辑瞿秋白的译文集《海上述林》。倘若如此去看,那么认为这个短篇包含有纪念瞿秋白的意思也并非不自然。瞿秋白也和小说中的禹一样,离开家人,四处奔波,辗转于苏联和中国各地,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在写作关于《理水》的文章时,我发现了精读鲁迅小说作品的妙趣。如果像读古典作品那样,咬文嚼字,翻辞书,查典故,一路读去,便会有各种各样的发现。另外,鲁迅的小说作品全部都有几种日译本,我是在一边检阅这些译文一边阅读的。特别是《故事新编》诸篇,因为是以古代作品为材料,所以这项工作给专攻中国文学的学生做演习再好不过。

据张梦阳介绍,在鲁迅小说中,在中国研究论文最多的是《阿Q正传》,其次是《狂人日记》,第三是《伤逝》。对现在的学生来说,读起来有趣的还是恋爱小说《伤逝》。由于这个缘故,我在做兼课教员的立命馆大学,拿四种文本让学生比较阅读,一种是鲁迅原文,一种是丸山常喜译文,一种是竹内好译文,最后一种是英译,因为也有英语专业的学生来听课。学生的结论是“涓生是最差劲的男人”。那么,鲁迅为什么写了这个最差劲的男人的故事?

我想,涓生这种最差劲的男人没有自由恋爱这一前提便不会出现。自由恋爱是近代的产物。倘若如此,那么鲁迅想要描写的不就正是近代本身吗?写小说的鲁迅本身在当时是处在怎样的状况里呢?……我和学生就此展开讨论。

另外,自1926年以来,除《故事新编》的历史小说外,鲁迅没再写小说。这与森鸥外恰好有些相似。想必是做不出了吧。其原因不正是尽管他把自己看做过去的遗产,但却在不知不觉中发现了置身于近代的作为近代人的自己吗?这样一来,他反倒写不出小说了。我想。虽然也想不怎么太不清楚。

时至今日,竟不禁要和鲁迅去一同自言自语:“做人真愈做愈难了”(1926年12月29日致韦素园)。

(作者系追手门学院大学教授)

关于鲁迅之种种

□(日本)浅野纯一